

新中国国徽设计中的上海美术力量

■ 吴海勇

新中国的三大标志——国旗、国歌、国徽，皆与上海有着深刻的历史因缘。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创作于三十年的上海，国旗五星红旗的原创设计稿是曾联松寄于上海，只有国徽与上海的关联较为隐秘。事实上，国徽设计起初以张仃为主，后加入张光宇、周令钊等人，在与梁思成、林徽因主持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竞争中，两设计团队互促互进，清华团队最后胜出收功。需要着重指出的是，新中国国徽吸纳了张仃团队的设计成果。而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皆与上海关系甚深。诚然，国徽设计是在北京，然而，源自上海的美术力量在这新政权的重重大国设计发挥了重要作用。

国徽征稿不理想，张仃担当设计重任

与国旗、国歌应征稿形成巨大落差，国徽图案应征稿初寥寥无几，且质量不高。新政协筹备会常委会所设的第六小组，专门负责国旗、国徽及国歌方案的拟定工作，组长马叙伦不无遗憾地指出：“关于国徽投稿者都误为国标，因此所有投稿者都有与国旗一样的国旗为国徽，真正符合我们所征求之国徽标准‘富丽堂皇者’还没有。”为此，该小组秘书彭光涵积极建议，“把我们的意见交给专家，可请专家根据我们的意见重新设计出图案来”。

1949年8月22日，征稿截止第二天，第六小组国徽初选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国徽图案初选一无所得。在马叙伦一再关切下，梁思成适时建议：“在国徽上一定要把中国传统艺术表现出来，汉唐有很多东西可供参考。”或许受此启发，沈雁冰、徐悲鸿、郑振铎等选出4幅图案作为参考。两天后，确认国徽图案“已另请专家拟制，俟收到图案之后再行提请决定”。第六小组的专家正是以张仃为主的设计团队。

之所以找张仃设计国徽图案，直接原因是他和周令钊设计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会徽方案，7月底获得通过。事实上，张仃美术设计方面的才艺早就闻名于党内军内。四十年代初，在延安的他就转向实用美术设计，设计了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延安分会的作家俱乐部与部徽，和延安青年剧院大门。艾青由衷赞叹：“张仃走到哪里，摩登就到哪里。”后张仃奉调至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工作，为话剧《抓壮丁》作舞台美术设计，为五省联防军政治部宣传队设计秧歌队服装等。抗战胜利后，张仃随军进入东北，1947年秋为东北解放战争胜利品展览会设计大门牌楼。1949年夏，中央军委借调他来平编辑《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大画册，封面即由其设计完成。张仃为此特意设计了一圆形图案：中上为八一军徽，下面是分列四面的四面军旗，外围以麦穗、缎带，交结于图案底部的“1949”。四面旗帜、麦穗、缎带等元素，实际上为新政协国徽设计作了先导。

张仃接受设计国徽任务之际，刚完成怀仁堂、勤政殿的设计改造。事实上，他还参与了国旗图案的设计，发给新政协代表的《国旗图案参考资料》共收国旗图案38个，其中5个方案，张仃皆与钟灵等列名其中，另有朱德设计的，当时社会颇为看好的复字第十五号是张仃一人画而成。在如此繁忙之际，张仃与钟灵展开了国徽设计工作。

第六小组9月23日分别召集11个分组会议，讨论的只是国旗国都纪年问题。合理的解释应是，与会代表意见集中赞同的是复字第一号国徽图案，因此无须专门开会讨论。该图案与新政协会徽极为相近，只是将五星由外框移至内部，取代四面红旗，其下仍为标红中国版图的地球，在麦穗下部细结处标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字样。毋庸置疑，这正是张仃团队的设计。在综合大家的意见后，张仃、钟灵又在复选第一号的基础上，作了5种修正图案。9月25日，以“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名义编印《国徽图案参考资料》，收入的正是这5种修正图案。

也是在9月25日的夜晚，毛泽东在中南海丰泽园会议厅召集国旗国都纪年国都纪年国都协商座谈会。起因是政协代表对国都纪年方案存有较多分歧，引起毛泽东、周恩来的高度重视。座谈会上，毛泽东推荐了曾联松设计的红地五星旗图案，获得在座者一致赞同好评。张奚若语出惊人：“现在这些图案太像苏联之国旗。”这无一不道理，苏联国旗也是由红五星、地球、麦穗、缎带等组成。一句话警醒毛泽东，他果断决定：“原小组还存在，再去设计。”

天安门元素在张仃创作思维中跃动

9月26日，国旗国都纪年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决定：“根据国徽图案参考资料，邀请专家另行拟制。”在张仃的设计团队之外，又邀请梁思成创办的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组建另一设计组。

梁思成接受国徽设计任务后，立即组织林徽因、莫宗江、邓以蛰、王逊、高庄行动起来，将其熔铸于铸金，把汉唐艺术在国徽上表现出来的理念贯彻到具体设计中去。10月23日，清华团队完成玉璧型国徽图案设计。该图案以“国名、五星、齿轮、嘉禾为主要题材”，“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名用隶书书写，“大小五星金星是采用国旗上的五星”，以大星居内圆，四小星在圈外围绕于下。

张仃团队在开国大典前将主要精力放在确保天安门会场的设计布置工作上。在此前后，天安门作为新中国的



设计者：张仃

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设计的国徽图案之一



▲ 张仃、张光宇、周令钊等设计的国徽图案之一



▲ 张光宇1947年留影



▲ 周令钊、陈若菊1949年订婚照，二人合作绘成天安门城楼巨幅毛主席像

象征开始在张仃的艺术思维中萌芽。人民政协国徽设计完成后，华北邮政总局派人来联系设计庆祝新政协胜利召开的纪念邮票。8月底，张仃、钟灵完成了邮票图案稿。后续设计工作交由上海供应处邮票科绘图员孙传哲承担。

开国大典后，张仃参与旧国立北平文艺节的接管工作，后成立中央美院，这使得张仃负责的国徽设计团队被后人标以“央美”之名。能者多劳，12月又开始为“迎接和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后的第一个新年”而忙碌，并负责大众图书出版社工作。这期间，他还承担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设计稿工作，与钟灵又合作了一回。设计稿是横构图，上半是毛泽东侧脸像，后衬以五星红旗，下半仍是斜透视的天安门。在后续邮票设计中，孙传哲将毛主席像改为正脸，又将五星红旗改画成凌空飘扬，为增强“中国人民从此站起来了”的视觉象征意味，横构图被改成竖构图。只有天安门建筑没有改变。1950年2月10日，“天安门图案（第一版）普通邮票”正式发行。天安门与华表的形状与方位，与庆祝新政协纪念邮票的极为相近，背景稍作调整。

参与邮票设计工作，特别是彰显天安门建筑的邮票面世，进一步强化了张仃将天安门元素加入国徽图案设计的创作意识。1950年5月29日，全国人民政协国旗国都纪年国都纪年方案审查委员会开会，专题商议国徽、国旗、国歌颁奖问题，这对于国徽设计不啻为一道催令。此际新增两种国徽图案，一为清华团队设计的玉璧型，另一就是张仃主导的新设计。张仃等人的新设计虽仍“取法原来五种造意”，但图案中出现了一个彩色写实的斜透视的天安门图形，替下了标红中国版图的地球。

为新中国国徽贡献徽章型式、主体元素

此时推进国徽设计工作，张仃整合了两位得力助手，一位是三十年代上海漫画界的领军人物张光宇，另一位是与张仃一起参与天安门布置设计的周令钊，天安门城楼上的巨幅毛主席像就是他在现场画的。三人彼此熟识，且都与

上海有着不解之缘，其中尤以张光宇在上海美术界深耕多年，在三十年代就成为漫画界老大哥而声名最大。

周令钊与上海的关联，可追溯到他早年在两湖学画期间，美术教师汪仲琼、高庄都是在上海攻习美术成才，且高庄生长之地江苏省宝山县，后属上海。1936年9月，周令钊到任上海纱厂任总工程师的舅舅的推荐，来沪在华东照相制版印刷公司学制版。“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周令钊住处为流弹击中，就此离开上海。后进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从事抗战宣传工作。1942年，周令钊同“三厅”撤退至桂林，刚好张光宇同家人也逃难至此。周令钊就主动结交，并有意识地学习张光宇的画作。张光宇装饰性极强的画风，在周令钊的商业广告创作、插画和抗战漫画中都留下学习借鉴的痕迹。

至于张仃与张光宇的交情，更是非同寻常。1936年张仃回南京，自己虽然发起成立了北平左翼美术家联盟，作品投稿有美联背景的上海刊物却石沉大海。在叶浅予的建议下，张仃往张光宇主编的《上海漫画》投稿，很快得以刊发，从此一发不可收。《上海漫画》第3期以大幅彩色珂罗版刊张仃两幅漫画，并冠以“全国漫画名作选”之名，且一次性付与15块银元稿费，相当于张仃在南京为报纸绘画一月收入的总和。以张光宇为首的上海漫画界就此为张仃敞开大门，除《上海漫画》，张仃还在《时代漫画》《泼克》等发表漫画作品，并由张仃拓展了南京发稿阵地。为了同这位漫画界后起之秀见上一面，张光宇有意留下7块钱稿费，让张仃到上海来取。尽管张仃并非想象中的东北大汉，但张光宇一见之下还是欢喜莫名，当晚就约鲁少飞、叶浅予、胡考等上海漫画界活跃分子六七人，到他家晚饭欢聚。

张仃是如此感激上海漫画界，正是叶浅予领队的救亡漫画宣传队在“八一三”后从上海来到南京，促其毅然加入。宣传队后到武汉，列为“三厅”麾下，张仃翌年赴陕宣传，抓住机会奔向革命圣地延安。张仃是如此感念张光宇对自己的知遇之恩，也真心佩服对方的美术才华。张光宇1949年12月由广州来北京，张仃很快安排他住进央美

术供应处宿舍，自己住前院，让张光宇住更僻静的后院。接着，张仃吸纳张光宇参与新中国成立一周年庆祝活动设计工作，同时让其参与国徽设计工作。

张仃回忆张光宇的重要艺术贡献：“一是参与了国徽设计。他参与提出的一些设计意见，如不同意梁思成先生以‘璧’为基本形象的构思，直接得到周总理的支持。”这段文字述及1950年6月国徽设计关键期两支团队设计理念的冲突。6月1日，政协一届全委会二次会议召开，4日，马叙伦作国徽工作报告。10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八次常委会会议，决定：“关于国徽修正案项，会议决定国徽小组讨论并由梁思成设计修改。”于是，翌日马叙伦召集沈雁冰、张奚若、及张仃、梁思成等开国徽组会议。

马叙伦通报那次常委会“议决采取国徽为天安门图案”。接着，张奚若转达意见，听说“有人批评它象日本房子，似乎有点像唐朝的建筑物”，原因是由于斜式太多。然而，梁思成当场表态，却并不认同天安门的国徽图案：“我觉得一个国徽并非是一张图画，亦不是画了一个万里长城、天安门等图式便算完事，其主要是表示民族传统精神。”他直白地说出自己的看法：“采取用天安门式不是一种最好的方法，最好的是要用传统精神或象征东西来表现的。”他还提出天安门国徽图式“在图案处理上感觉有点不满意”，“看起来好像一个商标，颜色太热闹庸俗，没有庄严的色彩”，进而着眼“技术方面”提出印刷、雕塑存在的问题。为此，张奚若、沈雁冰接连发言，不仅从“五四”运动发生地与新中国诞生地阐明天安门的历史象征意义，还婉转传达了以古代方式表达新政权异议。会议最后“原则上通过天安门图形”。

梁思成之所以反对天安门为国徽主体元素，主要是基于其保护北京中轴线古城的文化立场。1950年2月，梁思成郑重建议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应在旧城与西郊新市区之间，旨在保护北京城的历史艺术文物，天安门一旦成为新中国人民政权的象征，中央人民政府便要长驻中南海。在这种情况下，周恩来与梁思成及时沟通，有效促使梁思成迅速启动相关工作。梁思成如此说：“周总理提示我，要以天安门为主体，设计国徽的式样，我即邀请清华营建系的几位同人，共同讨论研究。”周恩来高超的说服艺术与崇高的人格魅力，于此可见一斑。

两天后，突然峰回路转。6月13日，全国人民政协常委会第九次会议议决：“国徽问题：图样尚未最后确定，决定后天将两种不同图样均带到会上最后取决。”于是，清华、央美两家设计组的积极行为不容抹煞。如果再加上给国徽制造模型且多有提升的清华团队成员高庄，那么，上海美术力量对于国徽设计的贡献更要增加分值。尽管当时美术家通常是多地域发展，堪称东西南北人，但是负责艺术、莫基社会影响的理念比拼、技术竞争得以延续。那几天，清华团队投入马力，不仅采纳天安门图形为主的原则，且创造性地解决国徽是否需要填写国名、颜色是否需要修改、用五星还是用一颗星等问题。清



▲ 中国人民解放战争三年战绩封面，张仃设计
▲ 国徽复选第一号修正图案5种，张仃、钟灵设计
▲ 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纪念邮票
▲ 庆祝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纪念邮票
▲ 清华团队设计的玉璧型国徽图案
▲ 清华团队设计的有天安门元素的国徽图案之一

“通天地人之儒”

——黄宗羲与科学人文的融合创新

■ 任春光 杨小明

明末清初的黄宗羲是公认的思想家、经史家，也是造诣极高、卓有建树的科学家。科学赋予黄宗羲经史之学一柄利器，也使其创立的清初浙东学派脱胎换骨、独树一帜。

关于《春秋》记载的36次日食，北宋天文学家卫朴独得35次，唯庄公十八年不入蚀法，“疑前史误耳”。然而卫朴之说，涉及两处比月频食，即连着两个月都发生日食的情形是不可能的。六百年后，黄宗羲作《春秋日食历》，以授时、西洋中西二历求得《春秋》襄公二十一年（前552）九、十月和襄公二十四年（前549）七、八月两次比月频食记录均在前食而后不食，并推出庄公十八年（前676）三月日食记录是可靠的，由此揭示卫朴的三处错误，而这与现代天文学的计算结果完全一致。痛心于授时历在西洋天文历法冲击下的衰微以至失传，黄宗羲著《授时历故》《授时假如》等书。前者是授时历立法原理的复原，后者是授时历计算的应用举例。黄宗羲是授时历传承和复兴的功臣，深刻影响了梅文鼎，现代科学家也是借助黄宗羲才搞清楚授时历“白道交周”等算法的意义。

黄宗羲为南明鲁王政权编制了1645、1649两年的历法，并行用于浙东地

区。门人万斯同特别是季子黄百家入京编修《明史·历志》，黄宗羲是幕后的主事者。黄宗羲对《明史·历志》有两大贡献，一是关于有明一代治历人物的评价。周述学、郭正中等人入《明史》录入，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黄宗羲的传记与引扬；二是历志中载有“作表之法”。读者据作表原理就能自行造表，不失为简洁实用的功效。这是黄宗羲的一大创见。

除会通三统、授时、回回和西洋中西诸历之外，黄宗羲还在数学、乐律、地理、医学等很多科学领域卓有造诣。“予注律吕、象数、周曆、历算、勾股、开方、地理之学，颇得前人所未发。”并通过讲学，引导弟子将科学与经史之学融合起来，自成一派之言。正如门人万经所言：“维时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摩厉，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春秋》日食考辨是黄宗羲应用科学助力经史研究的经典范例，同时成就了其天文考古、天文历史年代学先驱的地位。高学天文历算的方法利创，黄宗羲还考证了中国古史如武王伐纣年代、孔子生卒年月等。武王伐纣年代在今天仍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关键坐标点，黄宗羲的历算求解对后世具有很高的方法论示范

意义。在推得武王伐纣为公元前1122年的结果后，黄宗羲重新排定历代甲子的顺序，其第一甲子（黄帝元年）为公元前2697年。这一历史年份坐标，被主编《明史》的门人万斯同采纳。同时，黄宗羲推得孔子诞辰为公元前551年9月28日。

黄宗羲天文考古的最大成就莫过于通过反演春秋日食记录证实《古文尚书》乃是一本伪书。后来阎若璩应用黄宗羲的方法也推算证明东晋梅賾所献《古文尚书》乃是伪作。在清初学术界引致一场大地震，按梁启超的说法是“思想界之一大解放”。阎若璩受黄宗羲影响至深，其《古文尚书疏证》即请黄宗羲作序。

除天文历法之外，黄宗羲在数学、乐律、地理、医学等方面的科学素养也深刻塑造了其经史之学的样貌，即以“经解经”的经学、“六经载道”的史学和“文以载道”的文学等主张。后来章学诚“六经皆史”的源头正是黄宗羲的“六经载道”。科学更激发了黄宗羲批判的、解放

的哲学思想和破邪求实的启蒙精神。他以科学为思想方法利器，大胆批判了佛学、分野和上帝等中西“邪说”，集而题名《破邪论》。分野说，即认为天上州国吉凶与天上星次运行对应，是天人感应说法的变种。在破中国历史上甚嚣尘上的分野说时，黄宗羲就应用了天上星辰经纬度与地广尺寸悬殊难以对应、天上星宿与地上州国方位疏密不均衡以及先儒“其国始封之日，推步星所在”在理论上的荒谬等天文学证据。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说“清儒颇能用科学精神以治学”，黄宗羲及其浙东学派可谓先驱。清代浙东学派创自黄宗羲，历万斯同、全祖望至章学诚百年而不衰，是清代治史诸学派成就最大者。究其原因，与科学作用于经史之学密不可分。

中国有着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的悠久传统。孔子将“数”作为儒者与礼、乐、书并重的“六艺”之一，孟子和荀子萃

取出“苟求其故”“制天命而用之”的科学功能观，庄子借“机”释“道”——阐发了科学与人文的内在同一，司马迁高歌“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扬雄更将“通天地人”明确为儒者的理想人格。

黄宗羲痛惜地发现，这一优秀传统到宋代竟“失传”了，“有宋名臣，多不谙历法。……只有一流号号为博洽，而《春秋》日食三十六又为卫朴所欺”。这不仅是黄宗羲写作《春秋日食历》的源起，也是其重理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传统的动因。

姜希辙序黄宗羲《历学假如》推崇其是“所谓通天地人之儒也”，黄宗羲本人更是以精通包括乐律、天文在内的科学为儒者的本分。“夫律历，固儒者之内事。”即使抗清避居浙东化安山，古松流水，夜半猿啼，黄宗羲依旧布算筹，达到“痴绝”的忘我境地。黄宗羲在将科学应用于经史创新的同时，探索出一条新的经史研究之路——学术史的梳理，即以《宋元学案》《明儒学案》为代表的学案体。这是科学对学术思想方法的重要影响。

有感于明亡的血泪教训，黄宗羲对科学技术重要性的认识殊为深刻，并将作为取士的硬指标：“绝学者，如历算、乐律、测量、占候、火器、水利之类是也。郡县上之于朝，政府考其果有发明，使之待诏，否则罢归。”黄宗羲对科学的态度，

深刻影响了其子黄百家以至整个浙东学派。黄百家注解《宋元学案》特别是张载学说时，大段引用科学包括西方传入的最新科学，如哥白尼日心地说、括弧月相变化实验、西方气象学理论、日月食成因及蒙气差影响还有前人关于潮汐成因的解释等等。

与此同时，黄宗羲也谋求中国学术独立，这可以说是他力倡躬行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传统的初心所基。百年前的梁启超对此看得分明：“因治西算而证以古籍，吾国亦有固有之算学，因极力提倡以科学之独立，黄梨洲首倡此论，定九与彼不谋而合。”

“不事王侯，侍陵之风节；钅钞著述，同虞喜之传文。”作为明清之际三大思想家之一，黄宗羲的《明夷待访录》被海外誉为中国的“人权宣言”，“黄宗羲定律”以税收怪圈揭示了历代兴亡的经济原因，《宋元学案》《明儒学案》开中国学术史研究之先河，同时，黄宗羲还是一位了不起的科学家。以科学为思想和方法利器，黄宗羲不仅复兴了科学与人文融合创新的中华传统，而且将这一优秀文化升华为中国学术独立的坚实基础，这是黄宗羲留给我们今天的又一份沉甸甸的精神遗产。（作者单位分别为上海应用技术大学、东华大学）